

● 中国历史

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

牟发松, 李 磊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牟发松(1954-), 男, 湖北江陵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李磊(1977-),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摘要] 党锢名士的“婞直之风”, 通常被后世视为东汉士风的代表, 备受推崇。实际上东汉士风曾几经转变, 其转变之发生, 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东汉后期, 一方面儒生数量激增, 一方面宦官势力膨胀, 双方争夺政治资源的矛盾日趋激化, 士阶层的群体自觉意识亦日见彰显。在同宦官势力的斗争中, 士风由前期“保身怀方”的“去就之节”, 转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 最终激成党锢事变。党祸的惨烈结局, 迫使士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 正视现实, 士风亦由“婞直”而“退身穷处”、“念营苟全”, 而“大直若曲”, 讲究权谋。

[关键词] 东汉后期; 士风; 党锢之祸

[中图分类号] K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3-0267-07

一、从“去就之节”到“婞直之风”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论东汉士风之变:

至王莽专伪, 终于篡国, 忠义之流, 耻见纒缚, 遂乃荣华丘壑, 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 汉德重开, 而保身怀方, 弥相慕袭, 去就之节, 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 主荒政缪, 国命委于阉寺, 士子羞与为伍, 故匹夫抗愤, 处士横议, 遂乃激扬名声, 互相题拂, 品核公卿, 裁量执政, 婞直之风, 于斯行矣。

范晔以桓灵间为界将东汉风俗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承接新莽东汉之际的忠义守节之风, 重“去就之节”; 后期因“主荒政缪, 国命委于阉寺”, 转向“婞直之风”。然而据《后汉书·陈寔传论》: “汉自中世以下, 阉竖擅恣, 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又同书《逸民传序》: “自(章帝)后帝德稍衰, 邪孽当朝, 处子耿介, 羞与卿相等列, 至乃抗愤而不顾, 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 同夫作者, 列之此篇。”可知东汉前期士人虽多重“去就之节”, 但自和帝以后, 守节之风主要针对的是宦官专权, 与新莽东汉之际不同。如果说和帝以后, 守节避世是羞于与“邪孽”(即宦官)等列于朝的“处子”(即儒生), 对宦官势力的一种消极反抗, 那么, 如上引《党锢列传序》所言, 在桓灵时代, 士风由守节转为婞直, 则表明士大夫清流势力对宦官势力发起了主动进攻。当然, 士风的交替、转变, 只能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如《后汉纪》卷22 桓帝延熹九年袁宏论: “自兹(和帝)以降, 主失其权, 阉竖当朝, 佞邪在位, 忠义之士发愤忘难, 以明邪正之道, 而肆直之风盛矣。”就将“婞直(肆直)之风”的源头上溯自和帝时期, 与上述范晔所论略有不同^①。

我们知道, 和帝朝正是宦官势力开始抬头之时, 宦官势力的升降, 不仅直接影响到东汉的政治, 而且

深刻影响到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的士风。和帝以后,无论守节之风,还是婞直之风,其实都是针对宦官,问题是同是针对宦官当朝,何以在桓灵之间,士风的主流由“去就之节”转向“婞直之风”?如果先谈结论,则是当时宦官势力的膨胀导致与士大夫阶层矛盾的激化。

宦官势力自永元四年(92年)郑众诛窦宪始盛。顺帝阳嘉四年(135年),“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1](顺帝纪,第264页),这是“阉寺群在严密的汉法度中取得了政治上世袭的合法地位的宣告”^[2](第342,346页);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1](桓帝纪,第302页),则是宦官“取得封建礼俗崇隆仪式的宣告”^[2](第342,346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子制使本不应有子嗣的宦官,不仅取得了与士人同等的礼仪地位,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财富得以世袭,使宦官集团的集结和发展获得了更强大的动力,从此宦官势力得以更加持续稳定地发展;礼教注重“慎终追远”,礼俗上的三年丧服制,使依附于宦官的势力集团得到礼教所保障的社会地位。不过宦官势力的发展达于鼎盛,还是在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依靠宦官势力诛灭外戚梁冀之后。当时“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或登九列,或据三司”,“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并在社会上发展成强宗豪族^[1](宦者列传,第2535,2526,2510页)。

在士大夫看来,宦官掌权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事,早在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李固在对策中批评“常侍近臣,威权太重”^[3](卷18,第354页),建康元年(144年),皇甫规的对策又认为重用宦官导致“风坏俗败,招灾致寇”,主张“披扫其党,荡涤其贿,以答天诫”^[3](卷19,第378页),更何况宦官行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朝廷的长远利益,而是要“剥割萌黎,竞恣奢欲”,为此而不惜“构害明贤,专树党类”,“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三夷五宗”,使汉之纲纪大乱^[1](宦者列传,第2510页)。

另一方面,随着东汉时期公私儒学教育的扩大,特别太学生数量的剧增——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太学生增盛至3万余人,导致官员候补队伍,即希望走“通经入仕”道路的儒生数量相应激增^[2](第350-352页)。这些学而待仕的诸生,即所谓“游士”、“处士”,对宦官乱政的危害,体会更为深切,因为宦官“专树党类”的作法直接阻碍了他们的仕途。根据姚静波的研究,桓灵间官吏队伍相对稳定,宦官集团与处士的入仕呈此消彼长之势^[4](第89-92页),因而此间儒生数量的激增,势必使士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也使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是宦官“专树党类”,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意识即对本阶层的认同感,日益强化。其矛头所向不仅直指宦官,桓帝延熹二年李云上书,甚至直接指向了偏袒宦官的桓帝^[3](卷21,第410页)。

在士人的理解中,宦官专权妨碍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前途,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王符的观点就代表了当时士人对治乱的普遍看法:“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1](王符传,载实贡篇,第1638页)表明士人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在“朝廷日乱”的情况下愈益强烈。

这样,以清流自命的官僚与以太学生为主力的处士开始合流,频繁“交会”^[5](第567-598页),士的群体自觉意识也随之日益彰显^[6](第288-309页)。士林不再盛誉“保身怀方”这种带个人色彩的消极反抗,转而主张“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1](党锢传,第2207页),即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群体利益而积极抗争。对于陈蕃“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范曄在《陈蕃传论》中说他不是做不到保身怀方、独善其身(“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而是痛感士大夫竟以遁身矫洁为高,竟置人伦正义于不顾(“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所以才同宦官拼死相搏。他强调士对于天下的责任,并身体力行之:“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1](陈蕃传论,第2171页)同时,陈蕃还曾推荐一批最有名的处士逸民入朝任官^[1](黄宪传,第1746页)。可见,桓灵间士风转向婞直,也与时人对守节之风的有意矫正不无关联。

矫枉难免过正,士的最高价值既然被限定为经世济民,有道固然要仕,无道更要仕。陈蕃有“扫除天下”之志,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岑暄有“董正天下之志”,杜密有“厉俗志”。尹勋“为人刚毅直方。少时每读书,得忠臣义士之事,未尝不投书而仰叹”^[1](第2159,2203,2212,2197,1857页)。至于个人的得失乃

至生命,为了理想都可以忽略不记,一切人生问题、社会问题,都被简化为道义上的是与非。李膺曾劝钟瑾:“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1](钟皓传,第2064页)

二、婞直之风的流行与演变

据前引《后汉书·党锢传序》,范曄将婞直之风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即对执政者进行公开批评;其二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即士人自我标榜与相互标榜。就前者而言,桓帝即位至第一次党祸凡20年间,史载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太学生上书,其中两次是针对宦官,都达到了目的^②。士林舆论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议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1](申屠蟠传,第1752页);“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1](党锢传,第2186页)。激进的士人并不满足于舆论抨击,还诉诸行动,如荀昱为沛相,荀县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1](荀淑附传,第2050页)。士人既然自认其抗议运动是依据道义来涤荡朝廷,激清扬浊,因此他们相互之间的评价,也就以在抗议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品质作为标准^③,这就构成了婞直之风的第二个方面。这样,士林舆论就成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朝廷之外同时又对朝廷施加重要影响的力量。

士人对此局面是深受鼓舞的,他们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憧憬着从宦官浊流势力手中夺回政权特别是选举权的美好前程,故无不“争慕其风”^[1](申屠蟠传,第1752页)。范曄在《党锢传序》中略含批评地形容:“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但事态的发展及其结果,恰恰与士人的预期相反,婞直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还引来了两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祸使士人对朝廷深感失望,“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虽然此时形势危急,党人被书名王府,禁锢终身,但最终仍被赦归田里,元气未伤,其名声反而更高,如范滂赦归回乡之际,“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从而使党人更加坚信自己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婞直之风,“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1](党锢传,第2195、2206、2187页)。所谓“三君八顾”的称号便形成于此时,甚至州郡也模仿京城“另相署号,共为部党”^④,标志着士人与朝廷的对抗公开化、组织化。他们试图按照自己的道义标准,自立名号,与当朝分庭抗礼,发起一场重建道德秩序的社会运动。不仅如此,原先限于舆论范围的“清议”,最终发展成为诉诸暴力的武装政变,当陈蕃、窦武谋诛宦官时,“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1](窦武传,第2242页),“婞直之风”亦达于鼎盛。

陈、窦覆败,两次党锢之祸,特别是第二次党祸,“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1](党锢传,第2188页),士人日益感到生存的威胁。面对残酷的现实,“士大夫皆丧其气”^[1](窦武传,第2244页);郭泰哭之于野,感慨“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郭泰传,第2226页);《后汉书·逸民·陈留老父传》载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曰:“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形势出乎意料的逆转,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士人的信念受到严峻挑战,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匡正天下的能力,由失望、恐惧,走向怀疑、彷徨。著名党人范滂临死前对其子说的一番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1](党锢传,第2207页),正是这种彷徨、愤懑乃至绝望心境的体现。顾炎武从道义的角度赞赏“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7](卷13,“两汉风俗”条,第1009页),可能是忽略了“鼓动流俗、奋迅感慨”背后所隐藏着的信念危机。

当然,我们也看到,被害的党锢名士中,有很多人是主动投案或自决于死的。第二次党祸,自诣狱者有巴肃、李膺、范滂等人。巴肃说,“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李膺也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1](党锢传,第2203、2197页)。“谋不敢隐”,乃因为天下公义而“谋”,光明磊落;“事不辞难”,则因为正义而赴难,何惧于刑。生命被作为最后的投枪,以徇正义。党人的遭遇还激起了士林的普遍同情。景毅以其子为李膺门徒,却因名籍漏夺而不预党祸,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1](党锢传,第2197页);皇甫规耻不预党,自表为党人,“时人以为规贤”^[1](皇甫规传,第

2136页);孔融接纳张俭,事泄后“一门争死”,“融由是显名”^[1](孔融传,第2262页);范滂就义前其母勉励云:“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张俭亡命时“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而贾彪曾闭门不纳党人岑暄,“时人望之”^[1](党锢传,第2207,2210,2216页)。这就将婞直士风在行将谢幕前推向了最高潮。当士人们无法接受善的追求带来悲剧结局这样一种残酷现实时,以生命来演绎婞直,便成为他们维护正义、表达激愤的最后方式。同时这也是婞直士风作为一种时代风气的惯性使然,所谓“时人义之”,“时人望之”,就代表了当时士林的舆论和风气。在这种风气的洗礼下,或者说在这样一种士风的无形压迫下,为了名节,为了正义,士大夫是不应顾及后果或成效的,所谓“依仁蹈义”,“舍命不渝”。这就是“婞直”,或曰“肆直”。袁宏在赞赏“肆直之风有益于时”的同时,也冷静地看到其“使天下之人自置于必死之地”的弊病^[3](卷22,桓帝延熹九年袁宏论,第434页)。事实上历经陈、窦覆败及第二次党锢之祸,“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1](灵帝纪,建宁二年十月条,第330-331页),“天下善士”几乎被一网打尽,“肆直之风”的载体气节之士既被置诸死地,作为一个群体不复存在,这种风气自然也就无从继续存在,而不能不归于歇灭。

三、婞直之风的反动之一——退身穷处

在婞直之风大盛时就存在着这样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理智地预见到婞直的悲惨结局而隐身不仕,并与士林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在党锢之祸中得以明哲保身。当太学生肆直为风并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之时,申屠蟠独认为,“坑儒烧书之祸”将重演于今,“乃绝迹于梁碭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1](申屠蟠传,第1752页);姜肱在“隐身遁命,远浮海滨”前私告其友:盛明之朝,“犹当固其本志(不仕之志)”,“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1](姜肱传,第1750页);在第一次党锢前两年,徐孺子寄语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始终屡辟不至,不与名士结交^[1](徐孺传,第1747页)。那时,郭泰还很活跃,及至党事起,郭泰也转为消极,闭门教授,可见身为士林领袖的郭泰也开始怀疑士大夫以清议救国的实际效果。郭泰曾说:“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之象,潜居利贞之秋也。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术,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者。”^[3](卷23,建宁二年纪,第453页)。他判断时局大坏,已到“天之所废,不可支也”的地步,虽然是参据天象、卜卦与人事,恐怕主要还是基于他对人事即时局的判断,进而据以理解天象与卦象。无独有偶,荀爽在第一次党祸之后给李膺的信中,也谈到:

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辉,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

对于当时的局势,或以乾卦九二、九五当之,二爻爻辞并有“利见大人”,故据以判断形势的发展将对士大夫有利。然而,荀爽的判断却与之相反,他与郭林宗相同,都认为卦在“明夷”。按“明夷封离下坤上,离为日,坤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象征着黑暗的时代。又“天地气闭”辞出坤卦六四文言,“大人休否”辞出否卦九五爻辞,都是讲天下大乱,危亡迫近,士人务必立身谨慎,如履如临。总之,在郭泰和荀爽看来,他们面临的是一个“贤人隐”、智者避世远害的时代,至于其卜卦及其解释,不过是他们藉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洞悉的媒介^⑤。既然“直道不容于时”,时势如此,所以荀爽希望李膺能够“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这样“虽匿人望”,却能保身“远害”^[1](党锢传,第2195-2196页)。

上述可知,申屠蟠、姜肱、徐孺、郭泰、荀爽等人对婞直之风持有保留态度,主张明哲保身。但这并不是真的淡漠世事,而是对时局感到失望,同时也看到了士大夫能力的局限,即使婞直干政,生死以之,亦于事无补。如桓帝时安阳人魏桓数辞征辟,就是因为当时政治腐败,已无可救药,如正直为政,必将“生行死归”,与其如此,还不如“隐身不出”^[1](魏桓传,第1741页)。被李膺称之为“无是非之心”的钟瑾,却受到李膺祖父李脩、钟瑾叔父钟皓的夸奖,认为像钟瑾那样,“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保身全

家”为上,实属明智之举^[1](钟皓传,第2064页)。

在士林流行婞直之风时,这样的人物毕竟属于少数。党锢之变后,时世之不可救药成为共识,何颙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汉家将亡”^[1](党锢传,第2218页),士风亦由婞直干政转向“保身怀方”,即《后汉书·荀悦传》所说“士多退身穷处”。以婞直著称的党锢名士张俭、岑晷、夏馥等人,都相继走上了逃亡保命之路,即如夏馥所说:“且念营苟全,以庇性命。”^[1](党锢传,第2202页)。

伴随士人退身穷处的是失败的痛苦与理想破灭后的惶惑。如前所述,郭泰在陈、窦败死后哭之于野,显然是未尝忘情于政事的表现,三年后,亦即第二次党祸的两年后,他即英年早逝,不应与忧虑时局过甚无关。葛洪说他“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惶不定,载肥载臞”^[8](正郭,第455页),这对郭泰而言,确实是诛心之论。实际上非但郭泰如此,整个士阶层都陷入这种困惑。“志于道”的使命与残酷现实之间的背离,是他们心灵痛苦和彷徨的根源。应奉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1](应奉传,第1609页);袁闳从党事将作开始,自筑土室,散发绝世,潜身十八年^[1](袁闳传,第1526页);范冉推鹿车,载妻子,捋拾自资,风餐露宿,如此十余年,后结草室而居,临死时说“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1](独行传,第2689-2690页);都反映了这一时代“退身穷处”的士人们激愤、苦闷的心境。仲长统对当时士人的困境有如下的归纳:“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踟高天,踏厚地,犹恐有镇压之祸也”,“而清絮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1](仲长统传,载理乱篇,第1649,1648页)。相对于当年昂扬激越的“婞直”士风,恍若隔世。

党事后士人退而著书者尤多,率有所愤而发。如荀爽隐于海上,又南逃汉滨,十余年以著述为能事,遂称硕儒。所著有《汉语》,“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1](荀爽传,第2057页),又有《易传》,以解释人世正邪势力的冲突,并强调这种冲突是正义必然胜利的前兆^[9](第857-861页)。其侄荀悦,党祸后“托疾隐居”,亦有《申鉴》、《汉纪》等多种著作传世,其中《汉纪》,即是怀念“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1](荀悦传,第2062页)。陈寔子陈纪“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1](陈寔传,第2067页)。

四、婞直之风的反动之二——大直若屈

在党锢名士中,颍川陈寔的表现是与众不同的。第一次党祸时,“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其自动投狱,是出于稳定士心。后宦官张让父死归葬,“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表现了他对当时盛行的“婞直”之风持有保留态度。以后“(宦官)复诛党人,(张)让感寔,故多所全宥”^[1](陈寔传,第2066页),显示出陈寔有违流行士风而独具特色的举动,在客观上缓和了名士与宦官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宦官在镇压颍川郡名士时不至过分残酷。陈寔在当时“天下服其德”,后世亦享有极高声誉,考其言行出处,大抵“平心率物”,不为意气之争,不为过甚之举,注重实际效果,与当时的婞直时风颇有差异。范晔赞赏他“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可见其既发挥了士大夫匡时济世的理想功能,又不致自置或置人于必死之地。尽管如范晔所说,在当时,“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1](陈寔传论,第2069页),但他也预示着一种新的士风的到来。

荀爽因党事逃亡十余年后,于董卓执政时被迫出仕,“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即怀疑荀爽的出处是否合乎道义。范晔推原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并历举荀爽不顾个人安危,在迁都问题上营救杨彪、黄琬,又与王允、何颙谋诛董卓,试图挽救时已风雨飘摇的汉皇朝(“几振国命”),以证明荀爽的出仕,正是为了匡时济民。就政治理想而言,荀爽与党锢名士并无二致,只不过他没有采取“婞直”的方式,而是通过迂回曲折的手段,达到经邦济民的目的,“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1](荀爽传论,第2058页)。但这种方式不是“婞直”,却是“大直”,这不仅需要有济世之志,有“违贞吉而履虎尾”的胆量,而且更需要洞悉时局,讲求策略,出处合宜,措置得当,这与

上述陈寔的举动,实有异曲同工之妙^⑥。类似的还有王允出仕并谋诛董卓,范曄在传论中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士“本于忠义”,立身以正,但要实现忠义,还须辅以权谋^[1](王允传,第 2178 页)。

党锢名士以“婞直”方式斗争的失败,促使了气节之士向权谋之士的转变;汉末大乱的复杂局势,更加速了气节之士向权谋之士的转变^[10](第 127-139 页)。黄巾起义失败后,宦官与士人的矛盾再度激化,但这时士人的斗争方式不再是清议,而是直接策谋政变。先有中平元年(184 年)阎忠劝皇甫嵩起事^[1](皇甫嵩传,第 2302-2303 页),后有中平五年(188 年)陈蕃之子陈逸等人预谋在冀州兵变废掉灵帝^[11](武帝纪,注引司马彪之九州春秋,第 4 页)。但权谋的目的并不一定限定在维护汉朝的统治秩序上,甚至也不一定要以“天下”为念^[12](第 61-65 页)。如阎忠劝皇甫嵩起事就是要他推翻汉朝,自己称帝。士大夫不惜采用“非常之谋”,表明其思想观念、斗争手段已开始逾越儒家规范^[13](第 33-34 页)。

五、结 论

东汉后期,由于儒生数量的激增和宦官势力的膨胀,激化了双方争夺政治资源的矛盾,士阶层的群体自觉意识亦在同宦官势力的斗争中日见彰显,导致士风由前期的“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最终激成党锢事变。党祸的惨烈结局,迫使士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正视现实,士风亦由“婞直”而“退身穷处”、“念营苟全”,而“大直若曲”,讲究权谋。

东汉士风在桓灵间为一大变,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党锢因“婞直之风”而起,又改变了“婞直之风”。顾炎武将汉末以降“权诈迭进”、“趋势求利”之风归咎于曹操^[7](卷 13,两汉风俗条,第 1010 页),他可能是忽略了当时权谋之士的出现,实与汉末士风特别是婞直之风的反动有关。宋代程颢说:“东汉之士知名节,并不知节之以礼,遂至苦节。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达。”他倒是注意到了魏晋放达士风的兴起,与东汉“婞直之风”的盛极而衰有关^[14](第 34 页)。

东汉士风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基于士阶层的自我责任认知与社会政治形势的相互作用,在深层上反映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及其载体士大夫,与作为国家组织代表的皇权之间的矛盾^[15](第 132 页)。士大夫在吏与师的双重身份下,对皇权既相依靠又相冲突,当皇权及其附庸宦官集团因为私利而损害整个社会即天下的利益时,士大夫就会很自然地形成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舆论力量来维持社会正义,这当然是当局无法容忍的,必然会招致镇压^[16](第 79-82 页)。然而,当作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与国家权力处于势不两立的对峙状态之时,东汉政权的灭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司马光所谓“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17](卷 56,灵帝建宁二年,第 1823 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东汉士风的转变标志着汉武帝以来的国家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都面临着严重危机,它走到了必须转型的历史关头。

注 释:

- ① 关于袁滂与范序的区别,见牟发松《〈后汉书·班固传〉论评议》,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七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 ② 分别为永兴元年(153 年)讼朱穆;言铸大钱;延熹五年(162 年)讼赦皇甫规。见《后汉书》卷 43《朱穆传》,卷 57《刘陶传》;卷 65《皇甫规传》。
- ③ 如太学中语:“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见《后汉书》卷 67《党锢传》。
- ④ 如山阳张俭等二十四人刻石立碑,共为部党。见《后汉书》卷 67《党锢传》。
- ⑤ 陈启云《荀爽易传中的革命思想》对荀爽易学所解甚精,载《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⑥ 事实上,通脱为颍川荀氏之家风,其父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后汉书》卷 62《荀淑传》)。荀淑一定又与陈寔一家有密切交往,事见《世说新语》卷 1《德行》。关于陈寔、荀爽与党锢名士的不同之处,日本学者吉川忠夫氏在《范曄与后汉末期》(吉川氏《六朝精神史研究》,同朋舍 1984 年,第 191-192 页)一文中有所涉及,但主旨与本文不同,吉川氏主要就范曄的后汉书论而言。

[参 考 文 献]

- [1] 范 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侯外庐,等.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3] 袁 宏. 后汉纪[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 姚静波. 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J]. 史学集刊, 2001,(1).
- [5] 于迎春. 秦汉士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6]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7]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8] 葛 洪. 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9] [英]崔瑞德,[美]费正清. 剑桥中国秦汉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0] 胡宝国. 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J]. 历史研究, 1991,(5).
- [11] 陈 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2] 郝 虹.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J]. 山东大学学报,1999,(3).
- [13]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4] 侯外庐,等. 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5] 陈 明. 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 [16] 高 兵. 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J]. 齐鲁学刊,1998,(15).
- [1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On the Alternation of Elite's Ethos in Later East Han Dynasty

MOU Fa-song, LI Le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MOU Fa-song (1954-),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Wei & Jin, Southern & Northern, Sui & Tang Dynasties; LI Lei (1977-), male,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Wei & Jin,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ies.

Abstract: The upright and outspoken ethos of the well-known elites under the disaster of Party Sanction was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East Han's common practice. In fact, East Han's general mood of elites had got several alternations. The occurrence of its change was based on deep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In later period of the dynasty, while the quantity of Confucian scholars increased sharply, the influence of eunuch class inflate as well so that the fight for political resources between these two parties became more fierce. The conflict enhanced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elites and changed their ethos to upright and outspoken fashion from an attitude to shirk principled struggle so as to protect one's interest and safety. As the result of the conflict, the Party Sanction incident occurred. The horrible disaster of the Party Sanction made the elites ethos changed, the upright and outspoken fashion disappeared. Most of the elites chose the attitude to evade politic so as to protect their lives first, or in a tactful way to continue their struggle.

Key words: the later period of East Han Dynasty; ethos of elite; disaster of Party Sanction